

中國大陸中小學課程 的歷史淵源考略

黃 甫 全

本研究旨在通過對中國課程歷史變遷的梳理和對20世紀引進西方課程的考察，釐清中國大陸現行中小學課程的歷史淵源。研究結果表明，在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課程的產生與發展經歷了「原始」課程、「藝術」課程和「學科」課程三種基本形態。中國大陸中小學現行的「學科」課程形態，是在中國古代「原始」課程到「藝術」課程傳統的基礎上，通過20世紀分別從日本和前蘇聯引進西方課程而逐步形成的，其淵源是中國古代形成的傳統「藝術」課程和19世紀德國赫爾巴特學派建構的「學科」課程。當赫爾巴特學派的理論化、系統化的「學科」課程形態定型以後，往「東」傳播到日本，正在推行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府如獲至寶，全盤接受並迅即在全國推行。當它到了俄羅斯，同樣也受到獨裁的沙皇政府的鍾愛，而廣泛推行；及至到了蘇聯時期，這樣一種課程形態與強化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相吻合，就被繼承並加以發揚光大，進而形成了僵化的「蘇聯式」的學科課程形態。當中國在20世紀初期和中期打開國門分別向日本、前蘇聯學習時，就反覆地把源自赫爾巴特學派、並被日本和蘇聯分別進行了適應性改造和強化的「學科」課程形態引進國門，並在傳統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裏進行了進一步的適應性和強化性重塑，從而建構起了「中國式」的「學科」課程形態。

關鍵字：中小學、中國大陸、課程、課程史、學科課程

本文作者為華南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系系主任、教授；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育學博士；學術專長為教育文化學、課程與教學論

壹、引言

現實源自歷史，要面對現實就更需要面對歷史。因此，置身當代如火如荼的課程改革運動之中，審視人們熱火朝天地著力於研究和解決「改什麼」和「怎麼改」問題之時，歷史理性卻像一個幽靈一樣不依不饒地追問我們：「現行中小學課程來自何處？」這是發自我們靈魂深處的聲音，是對中國中小學課程改革命運的歷史關懷。

「現行中小學課程來自何處」的問題，關涉的是決定現行課程狀況和影響未來課程發展的課程歷史演變線索。我們擬通過對中國五千年的教育史進行專題考察，抽繹出中國課程的歷史演變線索，再深入探討中國現代課程改革中對西方課程的引進消化的歷程和狀況，從而釐清中國大陸現行中小學課程的歷史淵源，為進一步研究和解決「課程改革的內容和方法」問題提供一個歷史基礎和思路。

貳、中國課程的傳統與沿革

中國課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襯托著的是西方課程的歷史發展的廣闊背景。西方課程幾千年的歷史演變過程，可以歸納出四種循序相聯的不同課程形態（黃甫全，1998）：第一是流行於學校課程產生到西元前6世紀的「原始(primitive)」課程，第二是流行於西元前6世紀到西元14世紀的「藝術(art)」課程，第三是流行於15世紀到19世紀80年代的「學科(subject)」課程，第四是流行於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的「經驗(experience)」課程。

中國的學校課程也源遠流長，具有深厚的傳統淵源。早在原始的氏族公社末期，就創立了最早的有虞氏之「庠」、夏氏之「序」等學校教育，也就孕育出了學校課程。到了近代，西方學校課程連同其學校制度一起，在強力作用下被引進而本土化，形成了當代新型課程。概括起來，與西方相比較，中國漫長的課程發展史上，依次出現的有三種課程形態，即「原始」課程，「藝術」課程和「學科」課程。

一、「原始」課程

據考古所發現的古籍記載，中國的「原始」課程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

「原始」課程以道德教化為目的，雖然包含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之間關係的知識和經驗，但以人與人之間的「人倫關係」的知識和經驗為主。

根據教育史研究成果（毛禮銳和沈灌群，1985，頁35-38），我國的「原始」課程可以堯舜實施的「德教」課程為典型。堯舜時期的「德教」課程包括豐富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五教」、「三禮」和「一樂」。「五教」，即五常之教，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和「子孝」，使受教育者「明人倫」。「三禮」，即「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這是宗教禮儀，施以課程，使受教育者掌握「天文」知識和經驗，養成敬畏天、地、鬼神的虔敬德行，掌握組織舉行敬祭天地鬼神的宗教儀式的知識和經驗。「一樂」，即對受教育者施行樂教。樂教當時有兩項任務：一是培養顯貴後裔的德行，使他們掌握舉行宗教活動的樂舞技能；二是調和部落聯盟內部的矛盾，增強團結。

在原始課程裏，包涵著的教育目的是培養部落及其聯盟裏的「天子（部落聯盟的最高軍事首領）」、「君（部落的首領）」、「天官」以及部落顯貴。這與西方的「原始」課程的目的有相同之處，歸屬於職能主義(functionism)：課程須幫助受教育者長大後擔當起成人的角色。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當時採取了高壓強制性的教育方法和手段，甚至設置了「教刑」。《尚書·舜典》曰：「朴作教刑」。朴即檟杖，用以懲罰學生。

中國的這種「原始」課程隨著歷史的進程，流播於世，歷經2000年的奴隸社會而不衰。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官學漸衰，私學勃興，在文化、經濟、政治大發展的背景中，私學的課程發展超越了「原始」課程形態的職能主義觀念，在社會日益興盛的「用士養士」之風中，開創了「育士」的學校教育，從而產生了新的課程形態

二、「藝術」課程

中國的「藝術」課程形態，萌芽於春秋時代，成型於戰國期間，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的「藝術」課程形態，可以孔子私學的課程為典型代表。

孔子的教育基本目的是志道、弘道和行道，志道和弘道均落腳于行道。行道的途徑有二：一是設學收徒，擴大道的影響；二是從政做官，以道治國安邦。這樣，孔子的教育目的實質上就是培養士和君子。孔子之前，「士」是「國士」，即貴族的下層人物；「君子」實屬國君之子，或貴族上層人

專論

物。培育士和君子，一方面為平民進入上層社會開闢了道路，對改善社會結構有進步意義；另一方面，育士是為了順應社會的「用士」和「養士」之風，強化了知識份子與政治之間的「皮」「毛」關係，從而導致了幾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丟失「主體性」的深重傳統。孔子私學的課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

(一)內容主要包括「文、行、忠、信」

《論語·述而》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孔子以人文、品行、忠誠和信實教育學生，是指課程內容包括四個基本方面。

(二)開設的主要課程有禮、樂、射、禦、書、數等六門

這六門課程始自周代的學校，簡稱為「六藝」。《周禮·地官司徒》有記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而孔子繼承了這一科目設置，所以《史記·孔子世家》有專門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三)主要以《詩》、《書》、《禮》、《樂》、《易》和《春秋》等為教材

毛禮銳等人的研究（1983）表明：孔子「是通過《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教材來傳遞修己治人之道。」（頁45）

那個時代課程成就表現為三大特點：一是精心編制了專門教材，其中孔子所編寫的教材長期成為中國學校教育的經典教材。二是課程擔負起了整理、保留和傳播中國古代文化的職能，「六經」中除了《樂經》失傳，其餘「五經」，一直是我國長期流傳的古代經典著作，保留和傳播著中國的古代文化的精華。三是形成以「藝術」為主要內容和形式的課程結構。按照《辭源》（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等，1983）解釋：「藝術」乃「泛指各種技術技能。……藝謂書、數、射、禦，術謂醫、方、薑、筮。」（頁2731）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到了隋唐以後受科舉考試的影響，「藝」被不斷強化，「術」則一方面專門化了同時也就被學校教育所普遍忽視，逐步規範為重「藝」輕「術」和穩定性高、惰性強的課程形態，教材也逐步演化和規範化為孔子當年編定的「五經」，以及後人編成的「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

中國的「藝術」課程形態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直到洋人用槍炮打破了國門，人們才開始醒悟，落後的教育成了導致祖國科技、經濟、軍事甚至政治落後的主要原因。於是大批仁人志士致力於引進西方學校教育制度及其課程形態，促使傳統的「藝術」課程形態突然出現斷裂，西方的「學科」課程形態被囫圇吞棗地引入了我國。

三、「學科」課程

教育史研究表明（毛禮銳和沈灌群，1988），中國的「學科」課程形態是從19世紀末期開始構建的，至今已有100餘年的歷史。其間伴隨著社會巨變，在構建和發展「學科」課程過程中，有過三次比較大的變革。

第一次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在全社會要求變革強國、廢八股、變科舉、興學校的強大壓力下，經過反覆的鬥爭，到1903年清朝政府頒佈實施了《奏定學堂章程》，建立起了學校“學科”課程形態（頁231-233）。

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勝利推翻封建統治後，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頒發實施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之標準》，使徹底改革封建教育落實到了課程設置的層面（頁350）。

第三次是在1963年，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15年了，在學習前蘇聯、繼承老解放區經驗和改造舊教育與舊課程的過程中，在吸取大量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制定頒發了新的中小學課程（教育部，1963）。

參、日、蘇課程的引進和德國淵源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期間，在我國課程改革過程中，西方流行的「學科」課程不斷傳入，形成了我國課程的西方引進淵源。

一、清末民初引進日本課程

清末民初，我國在引進西方新的學校教育制度的同時，引進了配套的學校課程體系，當時主要是從東邊的近鄰日本國引進的。由於當時社會處於巨變關頭，這一引進經歷了兩次變革。第一次變革是在清末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引進，第二次變革是在民初，推翻了封建王朝，在共和體制條件下進行的引進。就小學課程設置而言，這兩次改革，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徵：

(一) 清末課程引進的特徵

在清末的引進中，我國小學的課程設置，在模仿當時日本小學的課程設置的同時，還保留了過去小學課程的一些特點，並沒有改變封建主義教育和課程的實質。日本1886年頒佈的《學校令》規定，小學分為兩等，即四年制的尋常小學和四年制高等小學。日本教育史（三好信浩，1993）記載：「尋常小學開設的基本科目為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術、體操，高等小學增加日本歷史、日本地理、外國地理、理科、圖畫、唱歌。另外，視地方條件，尋常小學可加設日本歷史，高等小學加設初級外國語，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女生加設縫紉，均為隨意科。」（頁109）而我國1903年頒發的《奏定學堂章程》也規定，小學分為兩等，即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必修科目有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算術、歷史、地理、格致、體操八科；另外，視地方條件可加設圖畫、手工一科或兩科，為隨意科。高等小學必修科目在初等小學基礎上再增加圖畫一科，達到九科；另外，視地方條件可加授手工、農業、商業等隨意科。對比分析起來，清末對日本課程的引進，有幾大特點（參見表一）：

表一 清末、民初中國引進日本小學課程的比較分析

	尋常 小學	修身	讀書	作文	習字	算術	體操						加設日本歷史，女生加設縫紉，為隨意科	
日本 (1886)	高等 小學	修身	讀書	作文	習字	算術	體操	日本 歷史	日本 地理	外國 地理	理科	圖畫	唱歌	加設初級外國語，女生加設縫紉，為隨意科
	初等 小學	修身	讀經 講經	中國 文學	算術	體操	歷史	地理		格致				視地方條件可加設圖畫、手工一科或兩科，為隨意科
清末 (1903)	高等 小學	修身	讀經 講經	中國 文學	算術	體操	歷史	地理		格致	圖書			視地方條件可加授手工、農業、商業等隨意科
	初小	修身		國文	算術	體操						遊戲		可加設圖畫、手工、唱歌一科或數科，女子加設裁縫。
民初 (1912)	高小	修身	手工	國文	算術	體操	歷史	地理	博物	理化	圖畫	遊戲		可加設唱歌、外國語、農工商一科或數科，女子加設裁縫。

1. 模仿日本的分段學制，把小學分為初等和高等兩級，同時引進了日本小學的主要科目設置。
2. 設置了「讀經講經」科目，繼承了我國傳統的「藝術」課程形態中的主要科目。在初級小學，《孝經》、《四書》、《禮記》節本為必讀的經書；在高級小學，經學教材，以《詩經》、《書經》、《易經》及《儀禮》的喪服經傳為必讀之書，講經以程朱傳注為依據。上課時間占2/5—1/3。
3. 加重了學生的課業負擔。一方面，日本尋常小學才設置六個科目，而我國初小卻增加到了八個科目；另一方面，在日本科目設置的基礎上，增多了「歷史」、「地理」和「格致」等「記憶性強」的科目，卻減少了「唱歌」這一「趣味性濃」的科目。
4. 模仿日本設置了隨意科目，即現在的選修課程。

這次引進，孕育出了我國課程改革中的一個課程思維和行為陷阱：在繼承傳統的旗幟下，僅僅注重課程中「傳統」與「現代」、「舊」與「新」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的簡單「綜合」，沒有深入到「轉換課程形態」的層面，去創造新的課程模式，以實現課程中「傳統」與「現代」、「舊」與「新」在新的課程形態中和新課程模式裏的實質「整合」。這種課程改革的思維和行為陷阱，至今仍然束縛和支配著我們。於是，在課程改革中，舊內容出不去，新內容又不斷進來，導致教育內容膨脹和課程超載問題愈演愈烈。

(二) 民初引進課程的特徵

在民初的引進中，辛亥革命的浪潮使人們超越了改良主義，用照搬當時日本小學的課程設置的方法，對清末建立的、打著封建傳統烙印的小學課程進行了徹底改造。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佈的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教育部頒佈的《普通教育暫行課程之標準》，所建立起來的新小學課程的特點有（參見表一）：

1. 照搬日本的小學分段學制，把小學分為初等和高等兩級，同時模仿日本的小學課程設置的科目名稱和數量。初小課程設置否定了清末的八個科目，而仿照日本開設5個科目，高小也仿照日本開設11個科目。
2. 廢除「讀經講經」科目，一律禁止使用清末頒行的教科書。
3. 創設了活動情意類課程。初小在引進日本的四門科目的基礎上，增設了「遊戲」課；高小除了增設了「遊戲」課外，還將手工規定為必修課，

同時將「日本」開設的「唱歌」並入「遊戲」課（在以後一段時期內，曾稱之為「唱遊」課）。

4. 模仿日本，設置了隨意科目。

在中學課程方面，教育史料記載（三好信浩，1993），日本1899年頒行的《中學校令施行規則》中所規定的普通中學課程設置為：「修身、國語及漢文、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及化學、法制及經濟、圖畫、唱歌和體操」（頁148）。呂達（1994）先生在進行了專門比較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民國初年普通中學校的課程，與清末普通中學堂的課程相比，多有沿襲之處。課程門類或者說架構，民初與清末沒有多大差別。二者都是以日本為學習的模式。」（頁256）（參見表二）

表二 清末、民初中國與日本普通中學課程設置比較
(注：此表引自呂達，1994，頁257)

日本 (1899)	修身		國語及 漢文	外國語	歷史	地理	數學	博物	物理及 化學	法制及 經濟	圖畫	唱歌	體操	
清末 (1899)	修身	讀經 講經	中國 文學	外國語	歷史	地理	數學	博物	物理及 化學	法制及 經濟	圖畫		體操	
民初 (1912)	修身		國文	外國語	歷史	地理	數學	博物	物化	法制 經濟	圖畫	樂歌	體操	手工

說明：民初的課程規定，女生加設家事、園藝、縫紉三科。

教育史記載（滕大春，1992b），日本以1886年頒佈《學校令》和1890年頒佈《教育敕語》為標誌建立起了「充滿著濃厚的國家主義的日本國民教育制度」及其課程體系（頁408）。由於歷史的限定，中國清末民初建立起來的中小學課程，基本上是對當時日本中小學課程體系的模仿。

二、新中國引進前蘇聯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改造舊教育的過程中，中國又從當時的蘇聯引進了中小學課程體系。

(一)蘇聯中小學課程的產生和形成

當時蘇聯的中小學課程體系，是在20世紀20-40年代經過反覆改革而逐步建立起來的。1920年教育人民委員部頒佈了革命後的第一份教學計劃

(滕大春, 1993), 規定勞動學校分為兩級(頁35)。1921年, 教育人民委員部國家學術委員會成立了教育科學組, 負責研製新的教學大綱。1923—1924年度公佈了新教學大綱——「綜合課程」(又被譯為「單元教學大綱」), 並隨之在各地學校實行, 以後逐步修改, 在所有學校推展, 一直執行到1930年。

1931年開始, 針對「綜合課程」導致的「系統性被破壞」、「知識質量下降」等嚴重問題, 蘇聯進行了高規格、大規模的課程改革, 建立以分科教學為核心的中小學統一學制、統一教學計劃、統一教學大綱和統一教材的課程體系。根據俄羅斯聯邦教育人民委員部制定實施的1932—1933學年度教學計劃(編譯組, 1976), 其中文化知識課的分量較重, 小學開設數學、俄語與文學、自然、社會學、地理、外語、造型藝術、音樂、體育、勞動等十門; 中學在小學基礎上, 再增開歷史、物理與天文、化學、軍訓等四門(頁341)。1934年6月9日,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1934)發佈《關於小學和不完全中學開設世界史和蘇聯史的初級課程的決定》, 規定小學三年級設80學時, 四年級設40學時, 介紹含世界史簡要知識和蘇聯簡史。這樣, 就形成比較固定的科目設置, 規定小學開設十一門科目, 中學開設十四門科目。

二戰後, 在恢復30年代形成的課程體系的基礎上, 進行適當修改, 用「蘇聯憲法」課取代了「政治」課, 取消了「勞動」課, 有典型代表性的是1947—1948學年度十年制教學計劃(編譯組, 1976), 小學開設俄語與文學、算術、自然、歷史、地理、體育、圖畫、唱歌等八門科目, 中學則開設俄語、文學、算術、代數幾何三角、自然、歷史、蘇聯憲法、地理、物理、天文、化學、外語、體育、軍訓、圖畫、製圖等十六門科目(頁343)。就這樣, 在逐步變化的過程中, 在管理制度上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權的體制, 從而建立了典型的中央一統型的課程體系。

(二)新中國照搬蘇聯中小學課程

新中國建立後, 在1953年到1956年間, 大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學習蘇聯的背景下, 教育和課程被「全盤蘇化」(黃甫全, 2000), 即照搬蘇聯的教育思想、「課程」理念、「課程」形式和「課程」結構, 把蘇聯「課程」模式照搬了進來(參見表三和表四)。典型表現為:

專論

表三 中國大陸50年代引進蘇聯小學課程設置的比較

蘇聯 (1932)	俄語與文學	數學	外語	社會學	地理	自然	體育	音樂	造型藝術	勞動	1934年開始增加 “蘇聯簡史”
蘇聯 (1947)	俄語與文學	算術		歷史	地理	自然	體育	唱歌	圖畫		
中國 (1955)	語文	算術		歷史	地理	自然	體育	唱歌	圖畫	手工勞動	
中國 (1963)	語文	數術	*外語	歷史	地理	自然	體育	音樂	圖畫	手工	生產常識 周會
中國*** (1994)	語文	數術	**	社會	思想品德	自然	體育	音樂	美術	勞動 活動類課程	晨會

說明：*師資條件具備的學校可以在五、六年級開設外國語，每周3課時，適當減少語文、數學課時。**實際上許多學校在四年級開始開設了外語。***1994年課程設置中另有地方安排課程。

表四 中國大陸引進蘇聯中學課程設置的比較

蘇聯 (1932)	俄語和文學		數學		自然	歷史	社會學	物理與天文	化學	外語	體育	軍訓	造型藝術	勞動
蘇聯 (1947)	俄語和文學	文學	算術	代數幾何三角	自然	歷史	蘇聯憲法	物理	化學	外語	體育	軍訓	圖書	制圖
中國 (1955)	語文	中國革命常試	數學	衛生常識	生物	歷史	共同綱領	物理	化學	外語	體育	社科基礎	圖書	制圖
中國 (1963)	語文	政治	數學	生產常識	生物	歷史		物理	化學	外語	體育		圖書	
中國 (1994)	語文	思想政治	數學		生物	歷史		物理	化學	外語	體育	晨會	美術	勞技

說明：中國1994年課程設置中另有地方安排課程。

- 取消了「課程」領域，同時也就取消了「課程理論研究」，只有「教學」領域，只有教學理論研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期。
- 借鑒蘇聯小學、不完全中學和完全中學的課程結構和科目設置，修訂形成了「蘇聯」式的小學和中學教學計劃（教育部，1953，1955）。
- 建立了蘇聯式中央集權的課程管理制度，全國中小學統一使用一個「教學計劃」、一套「教學大綱」和一套「教科書」（瞿葆奎，1993，頁

251-266；1991，頁131-142）。

4. 模仿蘇聯中小學主要科目的內容結構。
5. 規定外國語主要開設俄語。
6. 引進與移植蘇聯的教科書及其制度。

（三）新中國對西方學科課程的改造

50年代中期引進前蘇聯課程，由於受到從1956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衝擊，所研製的中小學課程並沒有完全落到實處。直到1963年，課程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調整，結果是教育部（1963）頒發實施了《全日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草案）》，規定小學開設語文、數學、外語、歷史、地理、自然、體育、音樂、圖畫、手工、生產常識和周會等課程，中學開設語文、政治、數學、生產常識、生物、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外語、體育、圖畫和音樂等課程，從而初步形成了有本土特點的規範化學科課程體系（黃甫全，2000）。

然而這一課程體系，實際上剛開始實行，就被接連而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所中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恢復了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背景裏，從1978年開始逐步修訂頒發了數種中小學教學計劃，其中有教育部1981年頒發的由兩套構成的《全日制六年制重點中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1984年頒發《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學教學計劃》（草案）和《全日制六年制農村小學教學計劃》（草案），基本上是對1963年頒發實施的《全日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草案）的恢復。

1985年大陸啓動了全面的中小學課程改革，先開展義務教育階段課程整體改革研究，隨後又開展了高中課程整體改革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國家教委1992年頒發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課程計劃》（試行）及配套的「二十四個學科教學大綱（試用）」；1994年，在每周工作44小時的新工時制條件下，又進行了調整，形成了兩套最新的方案（國家教委，1994a, 1994b）；到1996年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1996）印發了《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劃》（實驗），經過兩年多的實驗修改，1999年（教育部，1999）又公佈了《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劃》（實驗修訂稿）。新的課程計劃規定，小學開設語文、數學、社會、思想品德、自然、體育、音樂、美術、勞動、以及晨會和活動類課程，中學開設語文、思想政治、數學、生物、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外語、體

育、美術、音樂、勞動技術以及晨會和活動類課程。

上述考察清楚地表明，清末民初中國從日本引進了學科課程，新中國建立後又再次從前蘇聯引進了學科課程。到1963年頒佈實施統一而長期性的《全日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草案）後，便建立了穩定的學科課程形態。進入70年代末，匆忙中頒發實施的中小學課程，實際就是1963年課程的翻版。80年代以來，歷經10餘年的課程改革，各方面均有了改變，甚至在「課程計劃」的層面，構建起了「學科」加「活動」的新結構，但是在實踐層面，「活動」卻被學科化了。所以，作為課程形態的學科課程模式，在總體上基本沒有被觸及、沒有被改變（參見表三和表四）。

三、日、蘇俄課程的淵源

中國大陸現行中小學課程直接源自日本和前蘇聯，而日本和前蘇聯的課程又主要來自德國的近代中小學課程，來自德國赫爾巴特學派（Herbartist）的傳統課程思想。

(一) 日本、蘇俄課程科目設置的德國淵源

在19世紀，德國實行軍國主義教育政策，逐步形成了適應軍國主義發展需要的中小學分等分段學制和相應的學科課程的科目設置（Heinz-Elmar Tenorth, 1992, pp.143；藤大春, 1992b, 頁87-91）。19世紀下半期，日本的政要經過對歐美廣泛考察對比，選定以德國為榜樣，全力以赴，「學習德國，以德國的（國家）主義來排除英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建立適應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教育體系。」（藤大春, 1992b, 頁388）分別頒佈一系列法令，建立和實施了新的中小學課程的科目設置。前蘇聯在20世紀30-40年代建立了高度統一的學科課程，而追溯歷史，前蘇聯的這一課程體系，是源自十月革命以前沙俄時代的中小學課程。沙俄時代的中小學課程，則借鑒了當時德國的課程，建立了俄羅斯全境統一的中小學課程體系（康斯坦丁諾夫等編、吳式穎等譯, 1996, 頁308-374；藤大春, 1992b, 頁318-319）。分析比較起來（參看表五和表六），19世紀下半葉日本和沙俄的學校課程的科目設置，與德國的具有許多相同的特點：

附表五 19世紀末日本、俄國與德國小學課程的比較

德國 (1872)	國民學校	宗教	德語 1			算術	幾何	實科			圖書	唱歌	體操及裁縫		
日本 (1886)	尋常小學	修身	讀書	作文	習字	算術							體操		
俄國 (1897)	一級小學	神學	俄語	斯拉夫語	寫字	算術						宗教唱歌			
德國 (1872)	中間學校	宗教	德語		法語	算術	幾何	歷史	地理	理化	圖畫	唱歌	體操及裁縫	博物	
日本 (1886)	高等學校	修身	讀書	作文	習字	算術		日本歷史	日本地理	理科	圖畫	唱歌	體操		
俄國 (1897)	高等小學	神學	俄語		代數	算術	幾何	歷史	地理	物理	圖畫	唱歌	體育	自然	製圖

說明：1. 日本尋常小學加設日本歷史、女生加設縫紉，高等小學加設初級外國語、女生加設縫紉，為隨意科。

2. 表中德國的“德語”包括書寫、說話和閱讀；“實科”包括歷史、地理和理科；俄國的“歷史”？“俄國和世界史的初步知識”。

附表六 19世紀末日本、俄國與德國中學課程設置的比較

	文科中學	宗教	德語	書寫	拉丁語	希臘語	法語	歷史和地理	算術和數學	自然	圖畫				
	普通中學	修身	國語及漢文		外國語			歷史	地理	數學	博物	理化	圖畫	唱歌	法制及經濟
	文科中學	神學	俄語和文學		拉丁語	希臘語		歷史	地理	數學	自然	物理			
	實科中學	宗教	德語	習字	拉丁語	希臘語	法語	歷史和地理	算學和數學	自然	物理	圖畫			
	實科中學	神學	俄語和文學		現代外語1	現代外語2		歷史	地理	數學	自然	物理	圖畫	製圖	

注：其中的“俄語和文學”包括語法、斯拉夫語法、創作、古代文學和18世紀文學。

1. 模彷德國，日本將小學分為初小和高小，俄羅斯將初等教育分為第一級和第二級。
2. 俄羅斯像德國一樣，將中學分為「雙軌制」的文科中學和實科中學。
3. 學習德國，日本把傳統的道德教育置於首位，俄羅斯則把宗教教育置於

首位。德國中小學均開設「宗教」課，俄羅斯的初級學校、城市學校、文科中學和實科中學也開設「神學」課；日本則相應地開設「修身」課。

4. 與德國一樣，十分重視語文課程、特別重視古典語文課程。德國小學開設書寫、說話和閱讀課，中學開設德語、拉丁語、希臘語、法語以及英語等科目；日本小學則開設讀書、作文、習字課，中學則開設國語及漢文、外國語課。而俄羅斯初級學校和城市學校開設了比重較大的閱讀、書寫和俄語課或俄語和文學課，文科中學開設了占主導地位的包括語法、斯拉夫語法、創作、古代文學和18世紀文學在內的「俄語和文學」課以及「拉丁語」和「希臘語」課。

另外，俄羅斯實科中學特別重視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和工業技術技能。像德國實科中學一樣，取消了「希臘語」和「拉丁語」兩門古典語言，增開了兩門現代外語；開設了物理、自然科學等課程，十分重視圖畫和製圖課程。

(二) 日本和蘇俄與德國相同的中央「集權」課程管理體制

日本、蘇俄的學校課程與德國學校課程的歷史發展，在建立和實施國家「集權」的課程管理體制上，也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德國的課程管理體制「實質上仍是不折不扣的集權管理。」（藤大春，1992b），頁78）日本在1872年頒佈《學制》，統一了全國的學校和課程，逐步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教科書編輯、檢查和審定制度。俄羅斯長期是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具有中央集權的傳統，建立了中央統一的教育和課程管理制度（藤大春，1992b，頁285）。到蘇聯建立後，也建立了高度統一的教育和課程管理制度（瞿葆奎，1993）。一定的教育和課程管理體制，既是一定課程的背景條件，也是一定課程體系的有機組成成分。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日本和蘇俄與德國一樣，形成了中央「集權」的課程體制，這一歷史事實，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清晰地領略和體認到，日本的和前蘇聯的學科課程源自德國近代學科課程的特殊承繼關係。

(三) 德國學科課程的赫爾巴特學派理論淵源

作為德國人的赫爾巴特（Herbart，J. F., 1776—1841）與其弟子建立了著名的赫爾巴特學派(Herbartist)。分析對比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課程與教學理論主張與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中小學學科課程體系，可以清晰

地發現前者與後者的淵源關係（赫爾巴特著，張煥庭譯，1979；赫爾巴特著、尚仲衣譯，1936；藤大春，1992b；戴本博，1990）。

1. 赫爾巴特的教育培養具有「善意」和「服從」美德的人的目的論，合乎德意志皇室的利益而被採納。
2. 赫爾巴特的學生管理主張和訓育主張，為德國統治者進行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提供了基本規範。
3. 赫爾巴特學派的課程中心整合法，為當時的德國教育當局實踐化為對宗教、歷史和德語科目的不斷強化。
4. 赫爾巴特學派的教學形式階段說，也被當時的教育當局奉為聖明，在教育行政中化為對教學形式和方法的統一要求。

限於篇幅，更多的在豐富文獻資料基礎進行的有關分析、比較和歸納，在此就不再贅述。

肆、結論

通過上述考察，基本上釐清了中國中小學課程的歷史淵源，並梳理出了中西方課程產生和發展的基本線索及其相互關係，這裏用一個簡明示意圖，將其比較形象地加以歸納（參見附圖）。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西方的課程經歷了「原始」課程、「藝術」課程、「學科」課程與「經驗」課程等四種形態，而中國課程則只經歷了「原始」課程、「藝術」課程與「學科」課程等三種形態。

中國與西方的課程產生與發展之間的基本關係為，在古代，各自獨立發展，而到了近代，西方的「學科」課程傳入中國，迅速取代了中國傳統的「藝術」課程。中國現行的「學科」課程形態，主要是20世紀分別從日本和前蘇聯引進的，而根源是在19世紀德國赫爾巴特學派建構的「學科」課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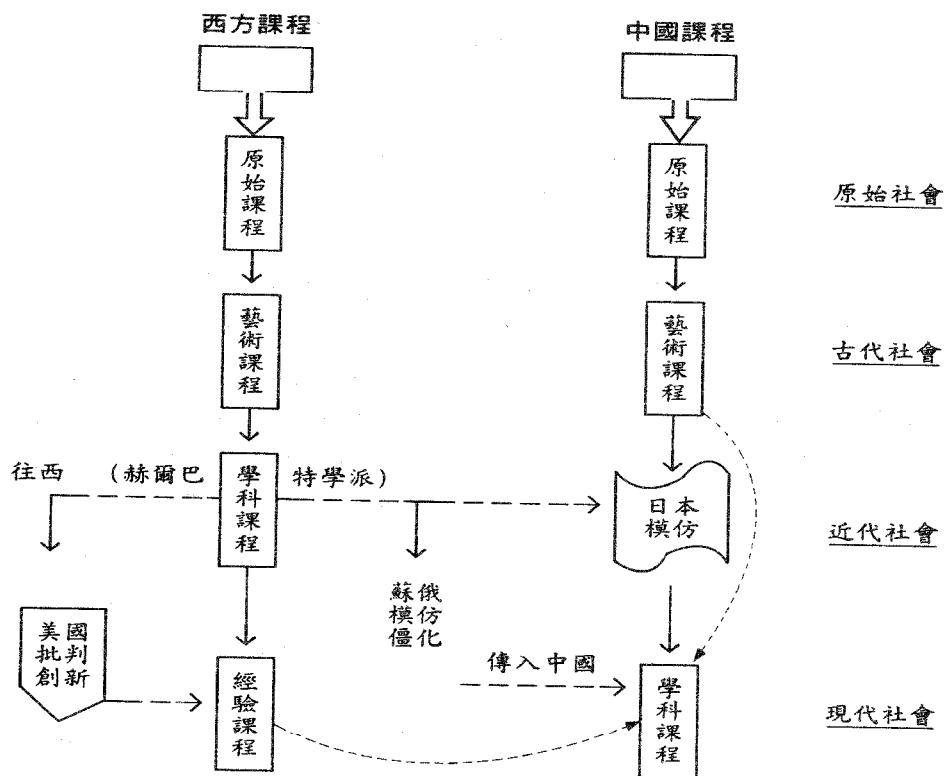
當赫爾巴特學派的理論化、系統化的「學科」課程形態定型以後，經過各種途徑向許多國家傳播，概括起來有「東、西」向兩條主要路線。令人驚異的是，兩條路線使「學科」課程的流播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學科」課程往「西」跨過大西洋，到了美國以後，迅即在學校教育實踐中引起了許多負效應，而被許多有識之士所批評和抨擊。然後引發了一場

專論

以杜威 (Dewey, J., 1859-1952) 為旗手的持久的進步教育運動，這場運動以赫爾巴特的「傳統」教育作為對立面加以徹底否定，同時也就徹底埋葬了赫爾巴特學派的「學科」課程，代之以以兒童社會活動為中心而建構起來的“經驗”課程形態。

然而不同的是，當赫爾巴特的「學科」課程往「東」傳播到日本後，正在推行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府如獲至寶，全盤接受並迅即在全國推行。當它到了俄羅斯之後，也得到了獨裁的沙皇政府的鍾愛，而廣泛推行；及至到了蘇聯時期，這樣一種課程形態與強化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相吻合，而被繼承並加以「發揚光大」，從而形成了僵化的「蘇聯式」的學科課程形態。當中國在20世紀初期和中期打開國門分別向日本、前蘇聯學習時，以中國古代形成的傳統「藝術」課程為基礎，反覆地把源自赫爾巴特學派、並被日本和蘇聯分別進行了適應性改造、強化的「學科」課程形態引進國門，並在傳統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裏進行了進一步的適應性和強化性重塑，從而建構起了「中國式」的「學科」課程形態。



附圖 中西方課程產生與發展及其相互關係示意圖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現行中小學課程，是在中國傳統的「藝術」課程的基礎上，通過引進西方學校課程的途徑建構起來的，首先在清末民初學習引進日本的學校課程，進而在新中國建立後又學習引進前蘇聯的學校課程。考察歷史發現，被中國引進的課程，實際上是日本和俄羅斯於19世紀分別從德國引進各自國內的，實質上是德國學校課程的日本版和蘇聯版。而追根溯源，當年德國的學校課程，核心是赫爾巴特學派的理論化、體系化了的「學科」課程形態。

輕輕地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慢慢地我們得出現實的基本結論：中國大陸現行中小學課程，既是19世紀德國的赫爾巴特學派的理論化、體系化了的「學科」課程形態的現代中國版，又內在地滲透著中國古代傳統“藝術”課程的精神。在大陸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的三次課程變革中（參看表三和表四），一方面突出重視“理論”輕視“實踐”，另一方面在科目設置等方面只有些微的變動，表現出中國傳統「藝術」課程重「藝」輕「術」、穩定性高和惰性強的特徵。

這樣，我們就明確了當前中國大陸課程改革的現實基礎和現行課程的歷史淵源和規定性。進而，一系列相關的重大問題，便接踵而至，越來越凸顯出來：中國古代課程究竟是怎麼樣的？中國古代課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中積累了什麼樣的精華同時衍生了哪些糟粕？中國古代課程傳統對現代中國課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赫爾巴特學派的理論化、體系化了的「學科」課程形態的根本問題有哪些？它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又積澱和孕育出了哪些自身無法克服的重要問題和根本缺陷？……這些都是在深化課程改革中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它們翹首等待著我們去深入研究並加以回答和解決。

參考文獻

- 三好信浩編（1993）。日本教育史（日文）。日本：福林出版社初版。
- 王天一等編著（1993）。外國教育通史（修訂本，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2版。。
- 毛禮銳等編（1983）。中國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毛禮銳和沈灌群主編（1985）：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

專論

社。

毛禮銳和沈灌群主編（1988）：中國教育通史·第四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呂達（1994）。中國近代課程史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1953）。中學教學計劃（修訂草案）。載于劉英傑主編（1993）。

「中國教育大

事典」（上）（370-371）。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1955）。小學教學計劃。載于劉英傑主編（1993）。「中國教育大事典」（上）（357-358）。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1963）。全日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草案）。載于劉英傑主編（1993）。

「中國教育大事典」（上）（359-375）。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1981）。全日制六年制重點中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載于劉英傑主編（1993）。「中國教育大事典」（上）（376-377）。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1984）。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學教學計劃；全日制六年制農村小學教學計劃。載

于劉英傑主編（1993）。「中國教育大事典」（上）（362-368）。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1999）。教育部辦公廳文件「教基廳函[1999]6號」。參見程材（2000）：教育部推薦「普通高中新課程方案」並徵求意見。載於「課程·教材·教法」，1，1-5。

國家教委（1992）。關於印發<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課程計劃（試行）>和二十四個學科教學大綱（試用）的通知。8月。載於「課程·教材·教法」，10，1-9。

國家教委（1994a）。貫徹執行國務院頒佈的新工時制對全國普通中小學今秋將實行調整後的教學計劃。1994年6月30日。載於「課程·教材·教法」，9，1。

國家教委（1994b）。實行新工時制對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課程（教學）計劃進行調整的意見。載於「課程·教材·教法」，9，2-5。

國家教委（1994c）。關於實行新工時制對高中教學計劃進行調整的意見。載於「課程·教材·教法」，9，6。

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1996）。關於印發「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劃（實驗）」的通知。載於「課程·教材·教法」，6，1-4、9。

- 康斯坦丁諾夫等編、吳式穎等譯（1996）。蘇聯教育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黃甫全（1998）。論課程範式的周期性突變律。載於「課程・教材・教法」，5，7-12。
- 黃甫全（2000）。20世紀下半葉大陸的課程改革：回顧與前瞻。載於臺灣「教育研究集刊」，1，117-242。
- 赫爾巴特著、尚仲衣譯（1936）。普通教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 赫爾巴特著、張煥庭譯（1979）。教育學講義綱要。載于張煥庭主編（1979）。「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30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等（1983）。辭源（修訂本・第四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滕大春主編（1992a）。外國教育通史・第三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滕大春主編（1992b）。外國教育通史・第四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滕大春主編（1993）。外國教育通史・第五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編譯組（1976）。外國教育發展史資料（近現代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瞿葆奎主編（1991）。教育學文集・中國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瞿葆奎主編（1993）。教育學文集・蘇聯教育改革（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戴本博主編（1990）。外國教育通史（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聯共（布）中央（1934）。關於小學和不完全中學開設世界史和蘇聯史的初級課程的決定。
- 載于瞿葆奎主編（1993）。「教育學文集・蘇聯教育改革」（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收稿日期：90.4.1；修改完成日期：90.9.27）

